

人，
岁月，
生活

第五部



伊里亚·爱伦堡著



2 036 8077 5

人, 岁月, 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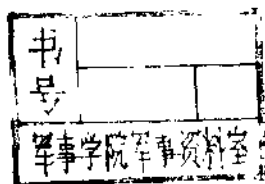
第五部

爱 伦 堡 著

秦顺新 冯南江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人, 岁月, 生活 (第五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8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1}{2}$

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 10919·2863 定价 0.85元

1

我将要叙述的那些年代，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涅克拉索夫、卡扎凯维奇、格罗斯曼、潘诺娃、贝尔戈列茨、别克（当然，这个名单远不是全部）对那些年代都做过出色的描写。请读者不要见怪，对于某些重大事件，我将只作简单的叙述，或者干脆只字不提；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得很清楚的事情。

我说过，在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欢乐和不幸，然而战争不仅使所有的人都穿上了保护色的衣服，甚至还不能容忍心灵上的多样性，年龄、性格特点、经历统统要向它让步。我在战争年代思想和感受，和我的全体同胞是一样的。

我也不愿意重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但我担心这难以避免。在《暴风雨》这部长长的小说中，许多会见、谈话、情景、心境都同作者的回忆有关。我记得尔热夫市有两座房子，它们各有一个外号：“上校”和“中校”，长篇小说的一个女主人公拉雅常常望着它们，我在明斯克看见过奥西普，当时一座座房子由于德国人在底下埋了地雷

而被炸毁，我在维尔纽斯同谢尔盖一起走进罗斯基地，并且我作为克雷洛夫医生在希格雷市住在一个曾经同德国军官同居的女人的家中。我所希望的并不是回忆一番过去的事件，而是打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看那些事件。

我的眼前出现了战争初期那几个月的情景。虽说人们对一切渐渐习惯了，形成了一套战时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一九四一年的夏秋两季，一座座城市象一棵棵树木一样辗转不安、吱吱作响，最后轰然一声倒了下去。一切都是那样陌生和难以理解——征兵站、告别、激昂的歌曲、眼泪、屋顶上的值勤、流言蜚语、象鼠疫或流行病一样可怕的“包围”这个字眼、长长的军用列车、挤满了难民的道路、日益增长的恐慌。在我的笔记本里是一串日期和城市的名字：六月二十六日——明斯克，七月一日——里加，七月十日——奥斯特罗夫，七月十四日——普斯科夫，七月十七日——威帖布斯克，七月二十日——斯摩棱斯克，八月十四日——克里沃罗格，八月二十日——诺夫戈罗德、哥美耳、赫尔松，八月二十六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九月一日——加特奇纳、卡霍夫卡，九月十三日——契尔尼戈夫、罗姆内，九月二十日——基辅……（我记下的只是我从《红星报》上读到的，战报绝大部分只谈“方向”。）我们在三个月内丧失的领土比整个法国还要大许多。现在这已经是历史了，但当时这对人却是致命的折磨。我们都是屏息以待下一次的战报。不久，收音

机便被拿走了，换上了一个“碟子”^①，“碟子”每天用嘶哑的声音报告两次消息，说瓦西里耶夫中士的班消灭了三辆敌人的坦克，说俘虏们讲德军的士气正在瓦解，说希腊或荷兰的爱国者向红军致敬，说我们在退却，一直在退却。

“有什么消息？”我问编辑部的卡尔波夫上校。他回答道：“维亚兹马方向，但维亚兹马已经放弃了。”要想了解点什么是不可可能的，只好相信了，而我也就和大家一起相信——不是相信战报——那些堵塞了莫斯科大街的携带着行李的难民了。

我遇见了许多人——有老朋友，有常来《红星报》编辑部的我不认识的人，去过军医院、飞机场，到过前线，同将军们和士兵们谈过话。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过西班牙战争，亲眼看见了法兰西的毁灭，我以为，自己对许多现象都是有准备的，但是我得承认，我有时也充满了绝望的情绪。而年轻一些的人则困惑地发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过去常常对他们说，敌人要是进犯我们的国土，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战争将在外国的领土上进行，可现在他们发现法西斯分子几乎是毫无阻拦地从布列斯特长驱直入，直达斯摩棱斯克。战报中反复地说着“敌人的优势兵力”，这类字眼应该说明许多问题，但却没有说明一个主要问题：为什么德国人有那么多的飞机

^① 指有线广播器的喇叭。

和坦克？

七月三号大清早，我们听了斯大林的讲话，他显然十分激动——听得见他喝水的声音，而且开始得异乎寻常，他用“兄弟姐妹们”、“朋友们”称呼我们。斯大林解释说，军事上的失利是由于突然进犯，他谈到了希特勒的“背信弃义”。同时他却反复地说，由于德苏条约，我们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做好防御的准备。大家默默地听完了广播。白天我在城里东奔西走。莫斯科当时天气很热。人们在林荫道、街心公园和大门道里谈话。普希金广场上的《消息报》的橱窗里挂着一张大地图。莫斯科人忧郁地看了看它，便四散回家了。

有谁知道，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多少疑虑、痛苦和不安啊！但我们哪有工夫对这作历史的评价呢——法西斯分子已经冲到莫斯科城下了！

在莫斯科河畔的大街小巷里，走过一队队的民兵，他们迈着零乱步子，喘着气，忍受着岁月和疾病加在他们身上的重压。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是没有人想到军容的。

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到不安，也和其他人一样，由于接踵而来的事件使我摆脱了许多怀疑。我生平从未这么紧张地工作过，一天平均写三、四篇文章；我坐在拉甫鲁辛斯基胡同的家里不停地敲打着打字机；傍晚去《红星报》编辑部，写第二天要见报的文章，阅读德国的文件和无线电截听来的材料，校订译稿，为照片写文字说明。关

于《红星报》，我下面再谈，现在我只想讲讲我的心情。我不断地证明我们一定会胜利。我相信胜利不是因为我把希望寄托在我国的资源或开辟第二战场上，而是因为我非常愿意这样相信——当时，无论是我或是我的同胞都没有其它办法可想。

从国外陆续有电报拍来：形形色色的报纸要求我给它们写点什么，有《每日先驱报》、《纽约邮报》、《法兰西日报》、瑞典报纸、美国的合众社等。不仅用词需要改变——对红军战士和对中立的瑞典人在论述上也不相同。我几乎每天都要发表广播演说——有时是对苏联听众，有时是对法国、捷克、波兰、挪威和南斯拉夫的听众。

罗佐夫斯基告诉我说，斯大林认为对美国和英国的工作极其重要。苏联情报局开始安排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广播大会，这些大会有斯拉夫人的，有犹太人的，有妇女的，有青年的。我在犹太人的广播大会上发了言。发言的还有索·米·米霍艾耳斯、谢·米·爱森斯坦、别列茨·马尔基什、达·贝尔逊、建筑师鲍·米·约凡以及彼·列·卡皮察等人。（八年后，有些发言者或在呼吁书上签了名的人仅仅因为参加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而被捕。）

就在那一天，我的一位老朋友、诗人布朗涅夫斯基来看望我——他刚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他情绪低沉，向我叙述了他在监禁期间的感受和思想，并对许多现象十

分愤慨。我对他说，现在应当打败法西斯分子，他微笑了一下道：“这个我比你知得早……”他说，他的命运就是蹲监狱，他知道这一点。如果打败了德国人，解放了波兰，他在那儿还会蹲监狱的。但愿蹲在波兰的监狱里——不是因为那儿好一些，而是因为他是波兰人。

布朗涅夫斯基是个满腔热情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我们是毕苏斯基当政时在华沙初次见面的，当时我心里立刻说，这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对于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当时我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我模糊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也理解布朗涅夫斯基。我们都是在十九世纪思想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憎恨民族的狭隘性，相信国界的概念即将寿终正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一切使我大吃一惊。我向笛卡尔寻求答案。然而历史从来不听逻辑课。我在西班牙懂得了人民的苦难，但那儿是内战；国际纵队战士的功绩仿佛是在承继巴黎公社、顿勃罗夫斯基^①、加里波的。我突然感觉到，有一个非常重要而顽强的东西——土地。我坐在莫斯科的街心公园里。旁边坐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她长得不漂亮，神情忧伤，有一副我极其熟悉的面容，她说：“别佳，别淘气，可怜可怜我……”我明白了，她是母亲，她可以为别佳而死。思想是思想，但也还有这个……

^① 顿勃罗夫斯基(1836—1871)，波兰卓越的革命家，巴黎公社的著名军事领袖。

七月底，对莫斯科的空袭开始了。在经历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大轰炸后，我觉得莫斯科的轰炸并不厉害——我们的空防工作很出色。但是对莫斯科人来说这却是新的事情。各人的性格不同，所以他们的举动也各不相同：一些人沉着，另一些人由于不习惯而惊慌失措，还有少数人甚至将行李袋也搬进了防空洞。轰炸常常迫使我留在《红星报》编辑部里。我们在小德米特罗夫卡大街的一座宅子的地下室里继续工作（我们开玩笑地称呼这个地下室叫“不怕死”）。当我清晨出来走在高尔基大街上的时候，我心情很快乐：所有的房子都完好无损！这些房子的建筑式样我一点也不喜欢，但我怀着柔情望着它们，就象望着从战斗中生还的亲人一样。

有一次我夜里从编辑部回家。我在拉甫鲁辛斯基胡同口被拦住，我们住的楼房被封锁了。消防队员在跑来跑去。我吓了一跳：柳芭和伊琳娜出了什么事？后来我在胡同里找到了她们，原来有一颗不大的炸弹落在我们那排楼房上，所有的人都被赶出了屋子。

七月二十六号，我在家里碰上了轰炸；我正在写文章。诗人谢尔文斯基被气浪震伤；我还记得他的喊声。炸弹在附近的亚基曼卡大街上爆炸。

有一天我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索·阿·罗佐夫斯基将德国人正在准备细菌战的文件拿给外国记者看。空袭警报响了，我在防空洞里正好碰见了美国作家考德威

尔和他的妻子。我们交谈起来；几个钟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警报解除之后，我同叶·彼·彼得罗夫一同往家走去。我们在尼古拉大街上，看见人们正在从房屋的废墟中拖出遇难者的尸体。远处大火的反光照红了半个天空。

还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里，罗佐夫斯基便召集了一些作家，谈到报纸工作的重要性。有些人当时就对他说，应该抛弃老一套的死板写法，让作家能够用自己的声音同读者交谈。罗佐夫斯基对此十分了解，但他的权力有限：决定权掌握在亚·谢·谢尔巴科夫手中。在我的笔记本里，有几行记述了我同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所作的一次困难的长谈（这是在九月三号）。我当时说，人们对公式化的文章不感兴趣，谢尔巴科夫回答道：“战前他们吃得太胖了……”话题后来转到了盟国的问题上。谢尔巴科夫说，我应当每天为西方写文章。我告诉他，我的文章在情报局里受到宰割，或者干脆就被压了下来。他生气地说道，“可你别再标新立异……”

在别的时候，这种谈话可能会使我心灰意冷，但我却继续工作；我哪有工夫去怀疑。当时有许多人大概都经历过这种时刻——有些人是在后方，有些人是在前线，他们都要碰到混乱、狭隘和不公正。然而，谁也没有停留在我们的缺点上，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和斗争；大家愿意牺牲一切。我想，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为痛苦的时代了，而那

些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却能引以自豪地去回忆它。

作家们长时期（自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意）对战争开始的那几个月保持沉默，他们的描写总是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反攻开始。然而实际上正是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里决定了一切的，人民在当时显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

当然，存在过张惶失措和混乱；我多次听见人们说这种生硬的话：“糟糕到这种地步”……我到过布良斯克前线的一个名叫阿冯尼诺的村子——我们从德国人手中把这个地方夺回了很短一个时期。一个女庄员给战士们送来了水，她认真地对他们说，抵抗是愚蠢的：德国人很有秩序，他们是坐汽车来的，穿的也很整齐，士兵们甚至还有巧克力糖吃。有人骂了一句。但也有一些人同情地叹了口气。

十月里，庄稼尚未收割。撤退常常是毫无秩序的。德国坦克突破了缺口，一直冲向东方。地方当局有时满不在乎地回答说：“用不着制造混乱”，但几个小时后他们也跑了。机关这个集体是一个有着“螺丝钉”和“齿轮”的庞然大物，在和平时期，它不论好歹只要工作就行，然而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却对它有不同的要求，那就是主动精神和个人的责任感。

我记得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演说。他那关于“吓破了胆的知识分子”的话刺伤了我。当然，在知识

分子中间也有惊慌失措的人，但是这种人决不比其他阶层的多。我不知道斯大林为什么又选中了我们知识分子作替罪羊。知识分子同人民一起在前线战斗，在卫生和兵工厂里工作。回想一下作家们吧：从第一天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担负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盖达尔、克雷莫夫、拉宾、哈兹列文、彼得罗夫、斯塔夫斯基、乌特金、维什涅夫斯基、格罗斯曼、西蒙诺夫、特瓦尔朵夫斯基、基尔山诺夫、苏尔科夫、李定、加布里洛维奇以及其他许多人立刻奔赴前线。我们都经受了很大痛苦，这不仅因为希特勒的军队的确强大，而且也因为看见战前的那些岁月对国防的影响有多么严重：自吹自擂，烧香敬神，大喊大叫和官僚主义，而主要的是使红军指挥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遭受的那个可怕的损失。

我翻阅了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到十一月间的全部旧报纸，——斯大林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过，这是多年来头一次没有他的像片，没有热烈的形容词；爆炸的烟雾驱散了香炉的清烟。（这么说，斯大林也明白，他应该让出点地方。）一些人知道自己是在保卫十月革命免遭愚钝而残酷的法西斯主义的侵犯，另有一些人则想的是自己的家，但人民坚持着，战斗着，苏联的知识分子也同人民一起投入了战斗。

外国人在绞尽脑汁想解答一个问题：俄国人的沉着是哪儿来的。有这样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俄罗斯的神

秘主义”、“长久忍耐的结果”、“东方的宿命论”。在莫斯科城下的反攻以后，一个美国记者对我说：“什么谜也没有——领土的辽阔拯救了你们。”初听起来，这种说法颇有说服力，但却没有说服我。我记得，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几乎毫无阻拦地从卡迪克斯冲到马德里城边，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正是在马德里的郊区遇到了极其猛烈的抵抗。即使莫斯科就在布列斯特的附近，十二月的事件也可能在九月或十月发生。

我记得自己在躲避空袭时同考德威尔的谈话。他问了我他想了解的一些问题，他说，对祖国土地的依恋之情想必是非常强烈的。我回答他道，我们既依恋俄罗斯的土地，也依恋苏维埃制度，虽然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我当时没有向考德威尔讲起我们的各种困难——自尊心妨碍着我。但我国人民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去和敌人决一死战并不是因为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当死亡就在面前时，单靠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从军事史家的观点来看，最初的几个月的情况是相当悲惨的。我们军队在什尔尼亚和布良斯克取得的小小胜利是无法抵消德国人的胜利的；敌人占领了我们大片的领土，包围了我们许多部队。但我并未丧失信心。我在布良斯克城下看见了我们的弱点，也看见了我们的优点；混乱现象层出不穷，联络工作十分糟糕；德国坦克长驱直入，而在空中敌人也远较我们强大。但是，甚至当人

们知道自己必将牺牲时，他们仍然在继续战斗，所以德国人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我在布良斯克认识了叶廖缅科将军。他正在同新入伍的战士谈话，他说得很好，很有感情。他坦白地说，所有的人开头都感到害怕，应当善于控制自己；他告诉战士们说，他小时候是个放羊的孩子。

我在那儿还遇见了那些“西班牙人”中间的一个——坦克兵彼得罗夫将军。他微笑着说：“记得吗？……同样的场面……只是在这儿，我看，我们能支持住……”我们坐在一座茅草房里。一个疲惫不堪的农妇在斥责自己的孩子：“安静点，将军正在思考呢……”

马车在道路上发出吱吱轧轧的响声。德国飞机在俯冲轰炸，我又看见了母亲俯在被炸死的孩子身上哭泣。苦难是多得数不清的，但是多么奇怪，人们在那些日子里彼此显得更为和善。我丝毫不想对此加以理想化。这是不折不扣的真实情况，在和平时期，人们可以为了公用厨房里的一只锅被挪动了位置或者在柜台旁为一块衣服料子而吵架，现在却能彼此分享一小块面包和帮助他人带孩子。

我在伏尔加河上碰见一个上了年纪的火车司机；他驾驶火车一连行驶了七十二个小时，他说，当自己困极了的时候，便停住火车用雪擦一擦脸。他对我的惊讶很是奇怪：“那又该怎么办？……如今只能这样……”文尼察

的一个年老的犹太女人到《红星报》编辑部来找我，她将自己逃出的经过告诉给我听，她步行了一百公里；后来被带上一辆汽车，并领了一个双亲均被德国人杀害的孩子。屠格涅夫博物馆从奥廖尔迁了出来，每到一个车站，馆长都要请求千万别将载有陈列品的车厢拆开。人们生气地说：“谁需要这个破烂？”因为车厢里有一只尽是窟窿的旧沙发；馆长成百次地说，这个沙发就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称呼为“催眠沙发”的那个沙发。人们心软了：“运走吧……”我现在谈的这些前后都不连贯。我写了一本《暴风雨》，那儿是有结构和情节的；而现在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日子里的情形，眼泪就要涌到喉边：人民遭到的苦难太深重了，他们实在不该遭受这种苦难。

德国军队迅速向莫斯科推进。人人都很忧愁。一个小女孩对母亲说：“妈妈，你把我再生回去吧！……”

《红星报》编辑部迁到了红军剧院的地下室里，人们说，那儿更安静些，因为是在地底下。剧院周围尽是坑洼和壕沟；夜晚一片漆黑；我摔了一跤，不过第二天要用的文章还是写出来了。

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情绪很坏。但人们有时必定得笑一笑。有一天，斯拉夫学家彼·格·鲍加迪列夫曾逗得我们大笑不已。我们是二十年代在布拉格认识的。他对古代捷克的民间创作远比对今日的作战地图熟悉得多。他走起路来就象刺猬一样拍拍地直响。这天早晨，

他兴高采烈地走来了，他说德国人很快就会被打败的。柳芭问他，这个好消息是哪儿听来的。彼得·格里果利耶维奇解释道：“我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有个人——不是普通人，是个军人——说，古德里安的军队快到莫斯科了。有许多坦克。这么说来，德国人会被赶走的。”鲍加迪列夫以为古德里安是亚美尼亚人。我们笑了很久，彼得·格里果利耶维奇闷闷不乐地说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笑的……”

到了十月中旬，在拉甫鲁辛斯基胡同的我们这座楼房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我不愿意离开。突然，叶·彼得罗夫打来电话说：谢尔巴科夫命令将情报局和情报局所属的一批作家撤退到后方去。在战争初期的那种混乱局面下，我被忘记列入编制。《红星报》的主编认为我是自己人。然而谢尔巴科夫说，我应该为国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写的文章要通过情报局发出。谢尔巴科夫是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同他是不能争吵的。

在喀山车站上，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我的一个小手提箱和《巴黎的陷落》第三部的手稿不见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混乱现象到处都有，我自己在巴塞罗那和巴黎已经领教过了。我后来感到有点难过，但在当时我对其他的事情考虑太多，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文学，我只惋惜自己丢了刮脸刀——我拿什么刮脸呢？……我们被带进一个通常是在郊区行驶的车厢里；车内拥挤不堪，转身都很困